

老教授论坛

LAOJIAOSHOU LUNTAN

LAOJIAOSHOU LUNTAN XILIELUNCONG

系列论丛(五)

主 编 商英伟

副主编 苏振富 杨际平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老教授论坛

LAOJIAOSHOULUNTAN
LAOJIAOSHOULUNTANXILIELUNCONG

系列论丛(五)

主 编 商英伟

副主编 苏振富 杨际平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教授论坛”系列论丛. 5/商英伟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615-2756-6

I. 老… II. 商…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787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集美石鼓路9号 邮编:361021)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插页:3

字数:308千字 印数:1-2 800册

定价:23.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老教授论坛》系列论丛编委会

主 任:商英伟

副主任:苏振富 杨际平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祉	王继勾	孙福生	杨孙楷
杨际平	苏振富	李承烈	李绪霭
吴仲平	何乃川	陈天择	周 济
姚安泽	黄 强	黄渭铭	商英伟
曾昭磐			

编辑室:杨际平 陈俊元 陈瑞荣 胡德芳

目 录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姚安泽(1)
“和谐世界”:蕴涵与核心,继承与创新,理想 与现实·····	吴仲平(18)
“人本人观”构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核心·····	苏振富(32)
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唯物辩证法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	池超波(42)
发扬优良学风 构建学习型政党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	欧阳传(51)
试论和谐社会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吴诗池(59)
谈 2006 年泰国的军事政变·····	孙福生(71)
创世界一流大学之我见·····	潘潮玄(83)
加速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推进教育和社会的 和谐发展·····	陈朝兴(94)
促进民办高校健康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厦门国际会展职业学院的回顾与展望·····	黄 强(106)
继承我国家教传统 建立现代家教观念·····	陈炳宜(114)
集美学校校训“诚毅”的思想内涵及渊源·····	王 社(129)
试论 21 世纪高校侨联在侨务工作中的独特作用·····	吴文华(139)
统计学的思路·····	颜金锐(150)

厦金经贸互动发展历程、机遇和展望	韩清海(160)
厦门民间组织在对台农业交流合作中的作用 和发展对策	陈瑞荣(171)
略论我国文化产业的建设问题	王善钧(177)
生物经济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	洪水根(187)
中国古代物理学硕果累累	许乔蓁(192)
基因的立论和遗传学的发展	王继勾(203)
《范蠡养鱼经》的科学内涵、启示与询考	陈世杰(209)
干细胞在医学中的应用	洪满贤(218)
应该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从关于“取消中医”的论争谈起	坚 煊(233)
怎样认识中医 ——释疑中医玄而迷信的网络言论	杨崇正(243)
老年性急性心肌梗死的不典型临床表现	许德禄(248)
厦门大学 174 位长寿老人的养生经验	黄少华(251)
老年人才资源开发的意义与对策	黄渭铭(255)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老年体育 文化的新生	江孝珠 郑如赐(263)
关于国学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郑剑顺(272)
国学,应当振兴什么	应锦襄(289)
董仲舒思想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何乃川(297)
儒家仁义道德观的境界 ——读韩愈《原道》札记	石文英(305)
“天人合一”话养生 ——《黄帝阴符经》诠释	郭其旭(314)

目 录

严复“国贵自主”的思想内涵及现实意义	周 济(330)
管子生平辨	李承烈(341)
古典诗词是中国国学的奇葩和炎黄文化 的骄傲	黄宝奎(348)
新词语的流行趋势及其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陈德三(356)
从中国同盟会的纲领看孙中山的革命策略	林其泉(370)
简析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 主张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	陈慰铨(375)
论林白水先生对推动辛亥革命的贡献	朱立文 刘淑玮(379)
《老教授论坛》系列论丛约稿通知	(385)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姚安泽

自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以来,便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经过长达 18 年在中国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于达到了成熟阶段,毛泽东于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是中国民主、民族革命中在理论上的一次巨大进展,从而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正确道路前进,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继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正是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仅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的基本特征进行探讨,这对于我们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迈进,对于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参见发表于《老教授论坛》系列论丛(四)上拙作《熟知并非真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

义伟大事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实践,对于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五大基本特征。

一、具有学习与应用同步并举的特征

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同步并举,主要表现在中国开始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便同时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两者相对地同时进行、同步并举,这便为能以最快速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几乎同步并举的特征,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的迫切需要,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根本特征,同时还反映了中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古训。近代中国既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又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社会矛盾极其错综复杂,要解决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理论为指导来帮助它,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恰好能满足中国革命实践的这种迫切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满足中国革命需要,立即拿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向三大敌人开战。由于这种战斗需要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首先是集中在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上,并且不是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是学了便立即去应用,去同中国革命实践联在一起,立即投入到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中去,这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例如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在论文中节

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陈独秀发表《劳动者觉悟》、《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等文章和讲演；李达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②；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③后来，成仿吾重译《共产党宣言》的《译后记》中对此评价说：当时日译本可能非常粗糙，陈（指陈望道——作者注）的译本也就多半很不准确（即使是这种情况——作者注），但是它对革命风暴前的中国的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④。对此，胡绳积极评价说：“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⑤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将它停留在单纯的理论、学术上，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并直接面向工人阶级，向工人宣传，同工人建立联系。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旧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有些人散布的是由于贫穷、愚昧、人口太多造成的。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⑥。但中国要搬走三座大山却要走与俄国城市起义不同的道路，这就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在这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中国便有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既依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按照中国化的实事求是精神，才真正找到适合于中国搬走三座大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创新道路。这就是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同步并举对于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作用之所在。

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同步并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头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我们步入21世纪继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因为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与建设之“的”,解决中国各个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因而尽管时代会变化,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的问题和任务,但是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实际问题则是不会变的。学习与应用成为一体,毛泽东在 1938 年便总结出来:“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⑥ 如果将学习与应用割裂开来,把学习当一码事,应用又是另一码事,学一套,应用另一套,或者是借口时代的变化、任务的不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已“过时”、“无用”抛弃,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精神的。特别是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时,我们更需要真学、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绝不能停顿。对于一些干部不能坚持学习与应用相一致,群众很有意见地说:“没有理想的讲理想,谁信? 嘴上呱呱叫,背后搞一套,谁听? 闪光的东西看不到,不正之风随风飘,谁服?”这说明,在当前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与应用同步并举这一特征,还是异常重要的和很有必要的。

二、具有认识与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特征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根本任务就是正确认识中国 and 有效改造中国,在认识和改造中,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中国风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性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事求是都是 1938 年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必然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中国落后、闭关锁国,介绍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很多,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准确的理解在所难免,加上中国是个

发展不平衡的落后又复杂的大国,对这样一个大国国情要能准确地把握,需要一定的过程,党本身也需要以务实求真的精神不断积累经验,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的:“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了、丰富得多了。”^⑥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因而到了1938年毛泽东才首次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重要概念。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概念进一步作了科学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⑦可见,“实事求是”的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何等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有个定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我们将在下一个特征中专门论述,这里先搞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民族形式”就是指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语言体系等,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通过中国一定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实事求是中国民族形式最典型的表现,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实事求是”证明了欧洲血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可以中国化的,起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示范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早有论及“实事求是”,汉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指出,献王刘德研究和收集古籍文献的态度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班固对刘德的这种态度作了肯定;唐代颜师古训为

“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⑥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作了中国民族形式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变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一种崭新的学风，从而起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典型示范作用。(2)“实事求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起到了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的作用。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思想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主观主义，开口闭口“拿本来”，把“本本”作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为了深刻批判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是这样评定的：“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⑦因而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才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3)“实事求是”起到了促进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作用。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基础，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正确与否都有其思想根源，“整党”、“整风”就是要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行动准则，以反对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加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总结的：“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⑧

实事求是对于步入21世纪的中国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认

为,它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仍然处于精髓、核心地位,这一点切不可丢掉。无论认识当今时代和国内外客观实际,还是进行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实事求是,都要有务实求真精神,讲真话办实事,做到正确反映和真正满足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需求。可是,对比起来还存在很大差距,不仅还有长期干扰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而且还有全套照搬西方的“洋教条”存在,他们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西方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了^⑨,便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切都依西方资本主义一套为标准。我们认为,在目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准则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局势下,确实有不少方面要接受按西方要求所定的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或者是利大于弊,我们应当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与国际接轨”,这才是实事求是的“与国际接轨”,这才是正确的。相反地,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完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为指导,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一套,一切以它为准则、为标准,那么,这样的“与国际接轨”就是违反实事求是的“洋教条”,也是错误的。所以,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离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便无法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上,我们应充分注意这种现实危险。

三、具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

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年,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论述了它的基本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而进一步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

花、结果,只有也只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这个根本原则,紧密结合好,革命、建设和改革才能取得胜利和成功,相反地,就会招致失误或失败。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对不能动摇的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⑤

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根本原则,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一条,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无法存在。这条根本原则由三个要素(基本原理、具体实际和紧密结合)有机组成,任何缺一均不可,任何不确实均不可,任何不到位均不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譬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上就不是很容易,基本原理使用的频率很高,但要给它一个准确完整的界定,却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指它揭示了事物的根本性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于基本原理同各国不断变化的实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对此曾给我们提出解决的方向和方法:“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⑥依据创始人的意向,我们认为:(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完全转变的社会发展

规律,在这个很长很长的整个转变时期,尽管各个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会有很大的变化,也会有很多的不同情况发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还是适用的,并没有“过时”,因而,国内有些人借口改革情况的新变化而有意无意地“淡化”、“边缘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不正确的,都是站不住脚的。(二)在“一般基本原理”之外的“个别地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那些革命措施”,并不是不变的,都是可以“修改”的,可以有不同表达,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成不变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同样是错误的。(三)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一定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这条基本原理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中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运用基本原理,如果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偶像化,表面上抬得很高,甚至神圣化,而在实际面前却无能为力,不能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实际问题,便会重蹈苏联与东欧的一些执政党所犯的错误,先是把马克思主义抬得很高很高,却不去“运用”、“结合”,后又把它当作“过时”、“无用”的东西抛弃。这种历史教训是深重的,也是重犯不得的,它同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是根本背离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真正把握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这个基本原则,以正确解决 21 世纪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有机统一的主要方面着手:(1)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才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才能正确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即老祖宗的基本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2)坚定地从中国国情出发,随时随地以中国历史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抓住精神实质,灵活运用才能正

确认识中国实际,有效改造中国,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长期生命力。(3)坚定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单讲民族化,单讲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特别讲时代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时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的主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快,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这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单讲民族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已经不够了,因而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述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产物。”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新方向,“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见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4)坚定地以新形势变化为依据,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开创21世纪新局面的实践需要有发展了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就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新的理论成果,我们应更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满足新的实践需要,即满足和指导加快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实践需要,满足和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实践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实践,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去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基本原则,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才能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